

学习参考资料

种試驗田—— 又紅又专的道路

辽宁人民出版社

种試驗田——又紅又专的道路

☆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沈阳市沈河区二段宫后街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证许可证文出字第4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

727×1030毫米·1/32开·26,000字·印数：1—13,04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0·67 定价0.08元

中共中央通知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 普遍推行种試驗田的經驗

中共中央决定把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試驗田的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并且要求全党各级組織加以討論，根据这个經驗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

这个报告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写的，說的也只是同时种試驗田的若干县中的一个县即紅安县的經驗。现在种試驗田的方法在湖北省已經比較盛行，其他省也有一些地方开始推广这个方法，某些工业企业中的干部也开始学习类似的工作方法。但是从整个来看，这个方法还远远没有在全国普及，全党就真討論一次紅安县的經驗还有重大的迫切的意义。种試驗田是一种徹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羣众中間去领导羣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紅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統一。我們全党的干部必須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統一，既不要作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不要作空头政治家。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試驗田的經驗，是完成党的整风任务的基本关键之一。除了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應該普遍种試驗田以外，从事工业工作、交通运输工作、财政貿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领导工作的同志，也應該認真研究种試驗田的方法，联系本身工作特点，得出必要結論，以便打掉官风，逐步达到又紅又专的目的。

中共中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 关于各级干部种試驗田的报告

中央并各地、县委：

从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后，我省农村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这个转变，和干部下放、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試驗田有密切的关系。干部种試驗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最近我省各县已经普遍地推行了这个办法，许多县在这方面有了显著的成效，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着农村工作的面貌。以红安县为例：该县共有县、区、乡、社四级干部一千四百七十名，亲自动手搞試驗田的有一千一百五十一名。其中有县委委员十四名，区委书记（指导组长）十七名，乡支部书记四十五名，社主任六百三十二名，共种了水稻試驗田六百四十六亩，花生試驗地四百七十六亩，还有棉花、红苕等作物的試驗地。这些試驗田的产量，都高于合作社一般田地的产量。县委委员、副县长萧林山培育的两亩水稻試驗田，获得了亩产水稻千斤的丰收纪录。七里区区委书记王作中的一亩花生試驗地获得亩产一千一百九十斤的纪录。此外，还有皮棉亩产一百斤，红苕亩产一万斤的丰产纪录。在試驗田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实现了大面积丰产。全县有三百一十三个粮食亩产一千斤的社，一百二十八个花生亩产八百斤的社，二十一个皮棉亩产一百斤的社。全县十五种农作

物样样丰收，全县七百三十二个合作社，社社增产。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八百零八斤，提前十年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指标。据红安县委报告，红安县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的经过情形是这样：

“四多”和“三愿三不愿”

1956年冬季以前，在县級机关里，流传着“四多”、“三愿三不愿”的说法。所谓“四多”，就是“骑自行车的多，打篮球的多，穿大衣的多，吃食堂的多”。所谓“三愿三不愿”就是“愿坐在屋里开会办公，不愿下乡领导生产；愿到先进社，不愿到落后社；愿和乡、社干部打交道，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县委委员十八人，经常下乡的只有三人，至多不过七人。有些县級机关的领导干部，缺乏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的观点，按时上班，照例休假，给农民增加了很多麻烦和不便，农民群众很不满意。例如两道乡乡长为了到县邮电局交涉架设电话线的问题，在外边等了个把钟头，无人理会，说是“没有时间”，等到“有时间”，又说，“下班了”，乡长很是恼火。所以，在以后，邮局干部到两道乡去找他了解有关业务情况的时候，他也说，“没有时间”。邮局干部等了一会又找他，他也说，“我下班了！”两道乡乡长的这种戏剧性的报复行为，反映了农民对于县級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满情绪。有些县級机关的领导干部不愿下乡，有的甚至即使“被迫”下乡，也是“人在乡下，心在城里”。例如税务局局长张福下乡才三天，就向乡干部说，“我要回到城里去剃头。”乡干部说，“我们给你找个好剃头师傅。”他说，“我要回到城里去洗澡。”乡干部说，“我们给你找个好洗澡盆。”他说，“我要回到城里去换衣服。”……就这样，骑着自行车溜回去了。由于上面领导的不深入，不具体，下

面干部也照样学。从上到下，都习惯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会议多”的现象又出现了。永何乡支部书记陈开和一个月开了二十八天的会，影响得那个乡的劳动出勤率只达到60%。许多干部不安心农村工作，认为在农村工作“没有前途”，因而在工作中深入不下去。金牛区的工作人员张汉兴，工作消极，好吃、好穿、好玩、好睡，在南台乡工作九个月，住了十四个社，社社都不欢迎他。前程社社员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张汉兴，不成人，白天光睡觉，夜晚熬死人。”许多合作社无人过问。桐柏乡联盟二社连年减产，该社驻社干部副区长韩维，就是一个所谓“挂名办社”的人。1956年这一年，是合作化的第一年，大家都缺乏办社经验，这是事实。但是，领导的不深入，不具体，一部分干部不安心农村工作，不热心办社，也是事实。因此，这一年，全县的合作社当中，减产社占10.7%，增产很少（5%—10%）的社占30%。

下放干部，表扬模范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的教育和鼓舞之下，县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的措施，改善领导，改进工作。主要的措施是精简上层，下放干部。派了十五个较强的区委干部，担任了十五个落后乡的总支书记，派了一百九十五个较强的区乡干部，担任了一百七十六个落后社的领导干部，并且采取了层层下放，长期固定在一个社里包工包产的办法。抽调了一百七十六名优秀的机关干部和八十七名乡干部，加强社的领导，又抽调了一千二百四十名社干部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对于所有下放到乡、社、队的干部，提出了长期负责到底的要求。鉴于有些干部是“人下放了，思想还没有下放”的情况，在全体干部中发动了一次对于先进人物模范事迹的讨论。这些先进人物如要求下

放，回乡积极办社的乡总支書記黎海清；大公无私，舍己为社的社主任江藤荣；大胆革新，不怕困难的社主任辛时龙；艰苦办社，变落后社为先进社的乡长汪遵湯；艰苦深入，团结帮助乡干部的机关下放干部叶敦文；模范烈士家屬徐大媽等同志的模范事迹，对于广大干部，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例如原来对于“下放”頗有抵触的下放干部陈洪国在参加了这次討論之后，檢討了自己的錯誤思想，决心在十里乡中心社干一輩子。经过干部下放和开展了这次討論之后，不仅社社有人負責，而且大大地激发了干部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和責任感。占店乡支部副書記黃成中过去东跑西走，早出晚归。自从固定駐社以后，三个月沒有回家一次。社員說他“去年当老婆的卫士，今年做了人民的勤务員”。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在干部下放的同时，县委強調了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县委十八个委員中，經常下乡的十四人，县級机关干部，輪流下乡，短期下放，县委办公室也搬到重点乡去了。但是，有些同志虽然下了乡，工作还是深入不下去。曾經三次申請調离农村的高桥区指导組长王树昌和农場乡支部書記邓开志，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檢查生产”，一个社員对他俩大声叫罵：“娘卖瘟的，搖搖摆摆，象个相公（少爷），莫把我們的田埂子踩塌了！”王树昌問：“你罵誰？”那个社員說，“我罵你！”王树昌把这个情况向当时在乡下工作的县委副書記張景田同志反映。張景田同志說，“罵的对！这是因为我們沒有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張景田同志向这个区的干部講了这件事，号召这个区的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本人带头花了一块多錢买了一把鋤头。在他的影响下，全区干部每人都买了一把鋤头。不久，全县农村干部一万零九百

二十五人中，有97%的人自備了鋤頭、鑿刀和勞動手冊，參加了生產。縣委組織部長潘知在八里鄉萬興社白天幫助社里犁田、送糞，夜里幫助社里搞包工包產。社員夸奖他是“文武雙全”。廣大幹部參加生產之后，和農民群眾的關係更加密切了，對於當時生產起了推動作用。但是，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幹部在參加社的生產的時候，往往被分派到和婦女、小孩在一塊干些輕活，不容易了解情況，發現問題。有的幹部雖然擔任了主要勞動，也是由於成天參加生產，忽視了領導生產，不了解全面情況，就很難系統地總結經驗，指導全面。例如張店鄉副鄉長熊傳統在星光社干了三天農活，開會時，一點情況也談不出來。他很苦惱地說：“這是搞的么名堂，累的腰酸背脹，工作還沒有做好！”差不多有半個月的時間，許多幹部都有著熊傳統的那種苦惱。看來光是一個人一把鋤頭，參加生產，還很難達到領導生產的目的。怎麼辦呢？

種了試驗田，實現了具體領導

縣委第一書記程鵬和農村工作部長庫崇德在縣委重點鄉杏花鄉建蘇社摸索到了一條經驗，這就是用領導幹部親自動手種試驗田的辦法，可以更好地做到參加生產、領導生產。

1957年3月間，正是花生播種的時候，程鵬和區技術站長祝翼宏一塊在建蘇社五峰崗生產隊選擇了一畝地作為花生試驗地，吸收了这个生產隊的技术員秦老五和對於花生生產有經驗的富裕中農秦必權參加了試驗地工作。程鵬依靠這些技術幹部和有經驗的農民，在這塊試驗地上親自試驗，認真研究，做出了活的榜樣。例如在花生播種的時候，當地的習慣是不上底肥，說什麼“花生不要肥”。程鵬問秦必權“怎麼辦？”秦說，他過去是看

田施肥，不光施水糞，還有草木灰。程鵬問祝翼宏“對不對？”祝翼宏說，對，不僅要氮肥，還要磷肥。商量的結果，就決定要施底肥。當地的習慣，下種只下一粒米或者兩粒米。秦必權說，他下過三粒米，增加了生產。技術幹部也主張三粒米。商量的結果，就決定下三粒米。當地的習慣是白子下地，技術幹部主張根瘤菌拌種。有人誤以為這是藥怕爛了種。經過程鵬和技術幹部解釋說，這是一種施肥的方法，於是，就決定用根瘤菌拌種。當地的習慣，花生不密植，程鵬和祝翼宏、秦必權、秦老五等商量，可以實行7×8寸密植。照上面說的辦法播種之後，花生苗長的很好。

又如，在花生薅草的時候，當地的習慣只薅一兩道草。程鵬訪問了有經驗的農民，他們說了三句順口溜，總結了花生薅草的經驗，這就是“頭草刮（即薅的淺），二草挖（即薅的深），三、四道草如綉花（即薅的細）”。並且說，在薅二道草的時候，要結合培土壅兜。商量的結果，決定這樣做了，花生苗越長越好。

又如，在抗旱的時候，有人說，“自古以來受了干的花生苗，不能澆水，一澆水就要瘁死。”程鵬和他的助手們研究的結果，受了干的花生苗一樣可以澆水。辦法是早晚澆，不會“瘁死”。商量的結果，這樣做了，戰勝了大旱。

有了這些活的榜樣，就召開現場會議，進行參觀評比辯論和總結。程鵬就是這樣在花生的播種到收穫的全部過程中，依靠自己親身參加的這塊試驗地，對於全县的花生生產實現了具體領導。其他縣委委員和區、鄉、社領導幹部也都是通過試驗田來實現對生產的具體領導。

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鉅匙

各級領導幹部親自種試驗田的方法，是最有力量的說服和

示范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三者相结合，对于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本身都有莫大的好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通过种试验田，找到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钥匙，找到了打破保守思想，推广先进经验，实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武器，打开了如何对农业生产实现全面的、深入的、具体的领导的“闷葫芦”，及时地了解了情况，发现了问题，倾听了群众的呼声，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可以有效地避免或者减少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更好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于技术干部来说，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提高了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向领导干部学习了群众运动的经验，向农民群众学习了生动活泼的生产经验，既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又提高了技术、业务水平。对于农民群众来说，最切身的实惠是增加了生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从而更加发挥了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面说的这些好处，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农民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试验田的方法，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现在试验田已经普遍到各个社和生产队，并且出现了大批的丰产田。

训练了崭新的技术队伍

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搞试验田的方法，是训练崭新的技术队伍的有效方法。红安县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七百六十六人（其中有知识分子干部一百二十二）中，学会了耕田、耙田、防治虫害、选种、拌种、掌握农业季节、栽秧、锄草的干部由1956年的18%，增加到1957年的66.2%。各级领导干部大部分都学会了基本的生产技术。这不仅对于加强生产的具体领导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于培养崭新的技术队伍也有决定意义。各级领导干部亲

自种試驗田，在做的当中，得到教訓，提高了覺悟，轉變了作风，增长了才干，更进一步获得了群众的爱戴和支持。以前到处不受欢迎，被社員諷刺为“不成人”的張汉兴，在亲自搞了試驗田之后，改变了社員对他的看法。社員們說，“張同志在我們社里干一輩子，我們也欢喜。”以前不安心农村工作，被社員諷刺为“洋荊”的知識分子龔全安，在种了試驗田，得到群众的表揚以后感慨地說：“出了家門进學門，出了學門进机关，出了机关进社門，談起生产是黑門。种了試驗田，生产入了門。”以前在田岸上檢查生产，挨了罵，被社員諷刺为“檢查官”的指导組長王树昌，現在被群众呼为“技术員”了。亲自搞了試驗田的干部都有这样的体会，从头到尾具体地熟悉了农作物的生产过程，学到了許多极为有用的生产知識，感到对于农业生产的领导，有兴趣，有劲头，有把握了。对于勤劳勇敢的农民群众的感情更加深厚了，对于农村的一切，特别是对于农作物的生长，也发生了感情。八里乡指导組長阮观胜在县里开完抗旱紧急會議以后，時間已是下午了，他赶了七十里路，回到自己所在的社，連門也不进，就赶到田里去看庄稼。沒有月光，沒有星光，也沒有手电，就伏到田埂上用手去摸田里有沒有水，他生怕田里的稻苗干死了。紅安县的广大干部由“人在乡下，心在城里”轉變为“人在城里，心在乡下”和“人在社里，心在田里”了。当然，这些和农民、和土地、和农作物、和农村的一切发生了感情的干部，現在不仅非常安心农村工作，而且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劲头正在越来越大。他們和群众商量的結果，满怀信心地制訂了1958年的生产规划，要求1958年全县的粮食和花生的每亩产量都达到九百斤，爭取达到一千斤，棉花每亩的产量达到一百斤；要求全县粮食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20%以上，花生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50%以上，

棉花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50%。

这就是红安县的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的经过情形。麻城、孝感等县的情形基本上也是这样。红安县委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一次总结。省委要求各地委、县委也象红安县委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检查和总结,要求他们学习红安县委改变领导方法,转变干部作风,派干部加强落后乡、落后社、落后队的领导,争取社社增产,各种作物样样丰收的经验,特别是要把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的方法坚持到底地干下去。总之,领导要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定实现。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中央指示。

中共湖北省委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原载1958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种试验田——又红又专的道路

——1958年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

湖北省红安县高桥区的指导组长王树昌和农场乡支部书记邓开志,有一次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检查生产”,一位社员对着他们大罵:“搖搖擺擺,象个相公(意即少爷),不要把我們的田埂子踩塌了!”王树昌問他:“你罵誰?”那位社員說:“我罵你!”王树昌把这个情况告诉当时下乡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張景田同志,張景田同志說,“罵的对!这是因为我們沒有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是的，罵的對。“搖搖擺擺，象個相公”，這是農民對那些不能具體領導他們生產、只會站在旁邊指手劃腳的干部的公正的評語。現在，王樹昌同志已經被農民們親熱地稱呼為“技術員”而不是“檢查官”了，因為他和紅安縣的其他許多干部一樣，親自動手同技術人員和老農一道，種“試驗田”，具體地領導生產了。但是，在全國各地，在各行各業，從一般干部到高級的領導干部，不是還有許多人在“搖搖擺擺”嗎？

說“搖搖擺擺”，對於我們許多同志來說是不舒服的，難堪的，但却是事實。我們有些干部，只願在機關里辦公，不願到下层去，高高在上，脫離群眾。有些人即使到了下层，但仍然人不到心不到，仍然是擺架子，指手劃腳。對於這樣的干部，首先必須打掉搖搖擺擺的官風。不把官風打掉，我們就不可能象黨中央和毛主席經常教導的那樣，成為群眾的親密朋友，和群眾打成一片；群眾也就不会真正把我們當成自己人，當成他們建設幸福生活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領導干部走出辦公室，放下架子，和農民一樣自己動手種莊稼，種試驗田或者叫做試驗地，是打掉官風的最有效辦法。這是領導作風上的革命，具有極其重大的歷史意義。紅安縣的許多干部，以前曾經是不願下鄉，不願下田，人在鄉下，心在城里，而在一年以來，經過種試驗田和其他一系列的措施，風氣却完全改變了，變得人在城里，心在鄉下，人在社里，心在田里。這就是說，他們的思想和感情，真正成為勞動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了，他們和廣大群眾的精神隔閡消除了。幾千年來，在舊社會中，當官的人都把勞動看成卑下的事情，我們要用自己的行動來告訴人民：勞動是光榮的事業。舊社會當官的都把自己看得比勞動者高一頭，我們要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人民：我們是和勞動者完全一樣、

完全平等的人。

走出办公室，种試驗田，不仅是领导作风的转变，而且是领导方法的新創造。毛澤东同志曾經說过，“我們共产党人無論进行何項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結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結合。”紅安县领导干部通过試驗，以自己的直接的实践，創造典型經驗，用这个經驗去领导和推动广泛的群众性的生产运动。这就一举而解决了个别与一般相結合和领导与群众相結合这两大問題。目前还有許多地方对生产的领导一般化，缺少深入的具体的指导，沒有創造和利用典型經驗，以推进全盘工作。在这样的地方，提倡领导干部同技术人員、有經驗的农民合作种試驗田，更有特別重大的意义。要知道只有深入下去，突破一点，才能創造和總結出具体的生动的經驗，更有成效地指导一般地区的工作。今天，生产的規模日益扩大，生产內容日益复杂，生产技术需要步步革新。空洞的一般化的领导，不仅不能推进生产，有时候甚至会阻碍生产的发展。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須积极推广紅安等地的领导方法。

紅安县领导干部自己动手种試驗田，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一般的领导方法的改进，它还有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意义。这是关系到在新形势下我們广大干部的努力方向的問題。

我們的干部队伍中，有許多同志曾经历了革命烽火的鍛炼，有比較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場，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忠心耿耿的，也有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經驗。他們大都在各个不同崗位上負担领导的責任，繼續领导着阶级斗争，同时领导着偉大的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事业。目前我国人民在一方面还需要繼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在政治战綫和思想

战綫上还需要繼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还需要最后完成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但是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却愈来愈成为我国的中心任务。我們还需要作艰巨的奋斗，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們的领导干部熟悉的阶级斗争的本領，有些快要閑起来了，而我們不熟悉的向自然界进行斗争的本領，则需要加紧学习。現在我們国家所急需的领导干部，就是完全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又具有充分的业务知識来組織和指导社会主义建設的人，也就是說，需要“又紅又专”的领导干部。紅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政治，专就是專門的业务和技术。政治是統帅，是灵魂，是一切业务和技术的保証。不問政治，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反之，如果完全不懂业务，沒有相当的技术知識，也就会成为“空头政治家”，不能在实际上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設的事业。沒有一个强大的又紅又专的干部队伍，就决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事业。我們共产党人曾經用坚忍不拔的努力学会了阶级斗争的本領，因此把强大的敌人打败了；現在，我們同样要用坚忍不拔的努力学会向自然界作斗争的本領，学会搞經濟、搞建設，学会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識，由外行学成內行。这是我們中国共产党人目前所面对着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任务。

领导干部种試驗田的重大的原則意义，在于这是我們許多领导干部走向又紅又专的道路。种試驗田，将使领导农业生产的同志們真正取得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知識，成为农业生产的內行，使他們能够成功地领导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这条道路，不仅是领导农业生产的同志的道路，而且也是所有做领导工作的同

志达到又紅又专的道路。毛澤东同志在“实践論”中說：“你要
有知識，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
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在我們几十年来的革命斗争中，那
一件成功的事情不是我們的领导干部亲身参加的呢？领导阶级
斗争需要这样，领导生产斗争同样需要这样。领导干部种試驗
田，不仅可以获得生产知識，使领导工作更加切合实际需要，大
大减少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毛病，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增加生
产的勇气和信心。现在有许多地区和許多部門的工作，突飞猛
进，一日千里，原因多半是因为领导干部开始真正鑽业务了，能
够在业务上开始切实地领导工作了。但是也还有许多同志并没
有真正鑽进去，老是在門外徘徊；或者是稍微学得一点，就自以
为已經成了內行，不願再深入学习。这样，他們的工作就进展很
慢，老是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这些同志如果不痛切猛省，奋起
直追，时代就会把他們远远抛在后面，他們原有的紅色也就会慢
慢淡下去。

为了把种試驗田的方法推广到全国一切农村工作者中去，
并且进一步推广到其他一切部門的领导工作者中去，还需要各
地方各方面的同志进行創造性的努力。我們希望所有工矿企业
的领导干部，以及交通、財貿、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领导干
部，都能走出办公室，深入下层，都来仿效种試驗田的办法，同劳
动群众和技术专家密切結合，認真学习必要的业务知識和技术
知識，成为自己行业的无产阶级专家，从而为我們党和国家迅速
地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又紅又专的干部队伍。

大转变和大跃进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王任重

1957年是红安县干部作风大转变的一年。干部作风的大转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1957年红安县遭受到相当严重的干旱；但是全县粮食的总产量却比丰收的1956年增加了十分之二，达到了亩产粮食八百斤以上。花生产量平均每亩六百斤，比1956年增加26%。各项副业收入比1956年增加140%还多。除了各种农作物以外，猪、牛、羊、鸡、鸭、鱼、兔都增加了不少。红安县的人民说1957年是“样样丰收、社社增产”，“五谷丰登”，“五色鲜明”；人们歌颂丰收的景象，“稻谷似黄金，花生满畈青，棉花如雪白，社员满面红”，“样样丰收，社社增产”，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红安县实践的經驗表明，采取全面规划、分作物负责的办法，抓住粮、棉、油增产为重点，同时可以使山林水产和各项副业得到迅速的发展。采取抓两头带动一般的方法，可以消灭落后乡，落后社，落后队，从而消灭减产社，达到社社增产的要求。

红安县委在1956年冬季，根据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指示，从打击歪风邪气（当时在部分干部中滋长着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整顿干部思想入手，采取了精简上层、下放干部、加强落后乡、落后社、领导干部分作物与分片固定负责的办法，扭转了领导干部坐机关和跑来跑去、不深入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根据党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的指示，红安县委的主要负责干部首先带头参加了